

中国国际观念的变化与巩固：动力与趋势*

朱立群，赵广成

(外交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 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第二, 转变的国际观念是否稳固以及稳固的驱动力量是什么; 第三, 中国国际观念进一步演变的趋势及其影响。本文认为, 1978年以来, 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其基本内涵是融入国际社会。目前, 中国的新国际观念正处于巩固阶段, 其巩固程度受三个变量的影响: 一是改革开放事业创造的巨大利益和带来的社会进步; 二是国内中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 从开放政策中获利的集团支持国际化路线; 三是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的合作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的国际观念将会继续朝着认同主导国际规范的方向发展, 但其内核中的中国特色也会进一步凸显。和谐世界的理念代表了中国国际观念发展的新阶段, 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观念影响世界。

关键词: 中国; 国际观念; 变化; 巩固; 动力; 趋势

中图分类号: D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386(2008)01-0018-09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部世界看到的更多是物质方面的变化, 也就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 实际上, 最大的变化是在观念上。从对外关系的角度, 30年来,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由反对、怀疑转向有限参与、积极合作和全面融入, 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种变化并非是工具理性的, 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规范特性。而且, 这种转变还在不断深化, 并且在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的融合中生成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新观念。21世纪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最终将是观念的影响。本文将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 简要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国际观念的转变; 第二, 讨论稳固国际观念转变的驱动力量; 第三, 分析中国国际观念进一步演变的趋势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一、30年来中国国际观念的根本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国家之间的有意识互动构成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人”, 其国际行为不仅受国际结构和国内政治影响, 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国际观念支配。国际观念影响国家的利益认知和外交政策制定。

“观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个方面^{[1](P8-9)}。国际观念就是“如何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观念”^{[2](P8)}。这种国际观念是一个国家作为集体所持有的世界观, 是关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实现自身利益有效手段的信念。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对国际社会性质的判断, 即如何看待当今世界, 它要回答这个世界是一个战争与冲突的世界, 还是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 二是对自我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定, 它要回答社会世界中的国家究竟是独立自主的个体间关系, 还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三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法选择, 即要回答国家以什么方式与世界保持关联, 是革命型的、游离型的还是融入型的。

不同的国家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和方法不同, 因而国际观念也就不同。当国家认为其利益可以通过加入、游离、推翻现有国际社会得以实现时, 其外交政策可能分别具有“融入主义”(integrationism)、“游离主义”(separatism)和“革命主义”(revisionism)三种类型化特征。融入主义的国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 对体系内的主导力量采取合作和协调的政策。游离主义超然于现行体系之外, 基本上不参与国际社会事务。革命主义国家则敌视现有国际社会

收稿日期: 2008-01-31

作者简介: 朱立群, 女, 外交学院教授; 赵广成, 男,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作者感谢秦亚青教授、贺弘景研究员、高飞副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的主导规范,并相信采取积极行动推翻这种秩序有助于其实现国家利益^①。

观念的存在和变化不像枪炮弹药等物质性力量那样易于评估,但却非完全不能衡量。从本质上说,国家的国际观念存在于公众领域,只有当公众都能感受时才能形成。因此,通过考察国家参与国际关系的符号和话语、关于“经验教训”的讨论或争论以及领导人其行为所作的辩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国家国际观念的存在及其变化^{[2](P 21-22)}。

30年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主导方向是融入主义的,即与国际社会主导规范接轨。这里我们采取文本分析的方法,将中共十大、十一大(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部分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中可以清晰发现中国国际观念演变的历程。

1.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国际观念

1978年以前主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一历史时段,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观念基本上是革命型的。国际观念的主导方面是斗争,合作为非主要方面。斗争的目标是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迎接世界革命的到来,在革命中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

具体表现在:(1)关于世界的本质。十大报告明确认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我们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2)关于威胁来源,主要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十一大报告指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绝不会有持久的和平”。(3)关于暴力的效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表示“随时

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4)关于外交政策原则,明确宣布中国贯彻执行“革命外交路线”。(5)关于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这一时期整体发展战略是对外封闭型的,但是对外战略贯穿“联合”的思想,提出第三世界是可靠的盟友,第二世界是结盟和团结的对象。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同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进行合作,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②。

2.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十四大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对外关系方面,虽然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可喜的发展”,因而做出了“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略判断^{[3](P 105)}。中国从此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了中国国际观念转型的历史进程,逐步形成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国际战略思想。十二大、十三大报告和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论述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国际观念的突出特点: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至上的“革命外交”,明确中国外交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取向^{[4](P 200)},实行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国际观念的鲜明特点是从革命型快速转向,开始对现有国际体系采取较为务实和有限参与的态度,国际观念的主导方面不再是斗争,而是强调合作。

(1)关于世界的本质。对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认识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十二大已不再谈论推翻帝国主义的旧世界,而是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这表明中国开始对现有国际秩序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2)关于威胁的来源,强调“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但中国表示愿同包括苏美两个

^①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pp.9-10. 秦亚青教授从“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变。他根据国家主导国际社会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的程度,将国家身份分为现状性、游离性、革命性三类;战略文化则分为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两种。他所说的国家“战略文化”与本文的国家国际观念都是指国家对主导国际社会所持的态度。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②本文中有关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引文,除注明者外,全部参见“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网站(<http://cpc.people.com.cn>)。

超级大国在内的一切国家发展正常的国家间关系。(3) 关于暴力的效用,虽仍高度关注战争问题,但已转向“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随时准备反侵略战争的调门明显降低。(4) 关于外交政策原则。十三大明确表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从而重新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并强调国家利益是中国制定战略方针的出发点。(5) 关于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中国开始由封闭走向对外开放,强调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但外交政策由过去的结盟改为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十二大政治报告和开幕词都高度强调独立自主的极端重要性,十三大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概念。

3.全面对外开放,快速融入国际社会(1994年—2002年)

1989年的政治风波,并没有导致中国政府对时代主题判断发生逆转,相反,十四大确立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国际观念由有限参与向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转变。

(1) 关于世界的本质。继续强调世界大局的和平稳定,其基本估计是:“整体和平、局部战争,整体缓和,局部紧张,整体稳定、局部动荡”^{[5](P522)}。“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十四大报告对“国际新秩序”进行了明确界定,要求把新秩序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同时,十四大和十五大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中国愿意加入到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秩序中来^{[4](P267)}。(2) 关于威胁的来源,主要强调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威胁来源越来越侧重以问题为主。从1996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中国与世界各大国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相继建立起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3) 关于暴力的效用。越来越多地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都强调世界的多样性和国家间的差异性,提出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循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协商和平加以解决,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4) 关于外交政策的原则。明确宣布中国对外关系的目的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继续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5) 关于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体现了高度的和平与合作精神,宣布中国将通过参加现有国际秩序来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十四大报告表示“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我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愿“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十五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4. 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新阶段(2003年到现在)十六大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周边和国际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国际观念有了新的重大变化。2005年以后,中国政府不再泛泛谈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整体发展战略。中国的国际观念开始趋于系统化,表现为全方位的开放和融入,对现有国际规范也表现出了更大程度的认同。

(1) 关于世界的本质。中国对世界整体形势的认识,由多极化和总体稳定发展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这是与此前国际观念的一个重大区别。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到“全球化”的概念,十六大报告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为4次,十七大报告进一步上升为9次。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到国际相互依存,认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①。(2) 关于威胁的来源,更多地强调威胁来自日益多元化的全球性问题。十七大报告指出,世界的不安宁表现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3) 关于暴力的效

^①相关引文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

用。十七大报告继续强调“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6](P 56)}，并突出软权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的执政党相信合作与共处哲学，暴力的效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4) 关于外交政策的原则。和谐世界要求“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因此，十七大报告宣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5) 关于实现外交目标的手段。与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高度强调“独立自主”不同的是，十六大以后开始突出相互依存，互利共赢，“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对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推进“世界革命”转向建设“和谐世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有重要影响者”^{[6](P 54)}。从具体内容上，中国国际观念的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国际社会性质的判断，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转变为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对自我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定，从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强调相互依存中的独立自主和互利共赢；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从革命、反抗到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的国际观念呈现出一个全新面貌。

二、新国际观念稳固的动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深刻转变。那么，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巩固的，还是脆弱的？我们可以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考察这一变化的稳固与否？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念的变化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集体观念的变化通常包括旧观念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巩固两

个阶段。任何观念本身都包含采取某种方法以达到某一预期的因果信念。当事态发展的后果与观念提供的预期大相径庭，即按照观念预期进行的社会实践归于失败时，旧观念就会在社会的集体反思和重新评估中解体^{[2](P11-17)}。而新观念的巩固则取决于可能替代旧观念的新观念数量，以及这些新观念所产生的初始效果。当存在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替代观念，而且表现出良好的初始效果时，集体观念的转变将会是逐渐巩固的；而当没有或存在着多个替代观念，或者虽有一个主导替代观念但其初始效果不尽人意时，新观念则难以巩固，并有可能导致旧观念的复活^{[2](P11-17)}。

同时，新观念的巩固，从根本上说是新的社会共有意义体系的确立。一方面，这既是一个国内有目的的政治控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聚集社会支持的过程。另一方面，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中国国际观念的转变，还需要国际社会的接受。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于国际社会的认知问题不予讨论。

因此，这里讨论的关于新观念的扎根问题，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三种推动力量。一是利益驱动，即新的观念必须带来良好的初始效果，否则替代观念还没有立足便可能夭折；二是社会驱动，新观念作为共有意义体系被社会群体或者主导力量所分享；三是领导驱动，社会领导力量引领观念变化，主导社会变革，推动社会前进。领导驱动的内在动力在于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需求。

1. 观念巩固的利益驱动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巨大成功，首先体现在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和进步，为新观念深入人心带来巨大的驱动力量。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中国的GDP总量由3624.1亿元增至26638.1亿元^{[7](P9)}，城乡居民收入翻了一番还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依存度看，1978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总额几乎为零，到1992年增长到192.03亿美元^①。1978-1997年

^①国家统计局编辑出版的《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均未收入1978年的中国利用外资数据。据前书统计，1979-1982年的4年间，中国合同利用外资总额194.9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30.60亿元；1992年，合同利用外资总额694.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92.03亿美元；到1993年，合同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别攀升到1232.73亿美元和389.60亿美元。参见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第68页。

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位次由1980年的第26位上升到1992年的第11位和1997年的第10位^{[8](P22)}。1987年中国提前三年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

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加速和整体推进阶段。此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1995年提前五年实现了“三步走”的第二步战略目标。2000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9]。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1979至2001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4%的快速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的379元增加到2002年的8214元^{[7](P9)},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06年中国GDP总量超过2.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对外贸易总额1760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中国GDP有望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

十四大确立的全面对外开放战略从时间上契合了19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由于这一轮全球化在范围、规模、内容以及经济生活社会化、国际化、市场化水平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并使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30年来循序渐进、逐步加速的对外开放表明,中国国际观念的转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成功,经济成功为巩固和发展新的观念创造了条件。

2. 观念巩固的社会驱动

观念的巩固不仅依赖于其所带来的普遍进步,还依赖于社会力量的普遍支持。二者相互关联,又意义各有不同。社会驱动最主要在于接受新观念群体的扩大,这对于形成新的共有意义体系至关重要。

中国国际观念的转变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30年来,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30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局部到整体、从较低层次到关键领域、从沿海到内地再到沿边,初步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几十年里,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速明显高于同期GDP的增速。1990年到1999年间,外贸依存度一直保持在30%—40%的增长区间。1999年以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从40%左右迅速增至65%,年均递增13.2%。2004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10](P29)}。1978年外商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几乎为零,1990—1994年间攀升到8.6%,近年来已经超过10%。中国的市场开放度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最高的,2004年中国关税税率平均水平为10.6%,2005年平均关税总水平仅为9.9%,超过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10%的水平^[11]。

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强劲成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全局中具有战略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据统计,1979年非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目前已经增长到40以上,占整个GDP的68%。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海外的投资与经营迅猛发展,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12](P12)}。

三是公民社会初步形成。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层化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自由发展和自由表达的空间越来越大,作为公民社会核心的非政府组织正在兴起^①。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如多元主义、公众参与、开放性、契约精神、法制原则等也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接受。

上述三方面的变化,使得国内出现了支持新国

^①我国目前将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根据民政部公布的统计资料,截止2006年底,中国共有社会团体191,94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1,303个、基金会1144个,三者合计达354,393个。参见中国民间组织网(<http://www.chinanpo.gov.cn/web/listTitle.do?dictionaryid=2202>)。有关研究认为,由于分工变化,大量非政府组织因找不到相关的挂靠单位而难以注册,致使所谓的草根非政府组织大量存在。因此,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是不完全的。

际观念的广泛力量。这一社会群体当然首先是那些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的经济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展开,不仅以沿海地区和非公有制经济为代表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支持改革开放的力量,而且随着开放战略逐渐向东北和西北等内地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源源不断地加入到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之中。当然,沿海地区大城市仍然还是中国推进国际化、接受新国际观念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向各个大城市区,特别是三个沿海城市群集聚。预计各大城市区将容纳全国人口的50%,创造全国GDP的85%^{[12](P12)}。这些渐成规模的沿海城市带成了联结中国与国际交往的核心区域,是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坚强后盾。

其次是中产阶级的不断成长。改革开放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中产阶级,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化。目前中产阶级的比例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25%^①。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中产阶级在沟通国内外联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是融入国际社会的支持者,因而也是新国际观念的分享者。

3. 观念巩固的领导驱动

新国际观念的巩固离不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本身就是有目的地控制共有意义的过程,对共有意义体系的控制,是实行统治的内在需求和本质特征。总体上说,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和观念的转变离不开精英甚至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推动^{[13](P9-20)}。实际上,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就来自于上层^{[14](P199-220)}。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执政党的现行政策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追求合法性和稳定执政的驱动力,又推动执政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来,当改革开放的目标受到国内条件约束

时,中国政府往往通过国际力量打破相关的约束;而当国际力量无论是有利于或不利于实现目标时,执政党则通过调整和设计国内制度,使得国际因素有利于国内的改革,从而逐渐打破经济和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国内约束^{[15](P11-13)}。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国际观念的创新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开放,坚持不懈地走融入国际社会的路线,中国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是因为,执政党相信,“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16]。中国自身的命运和执政党的命运是密切关联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通过改革开放,转变观念,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②,才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因此说,领导推动也是国际新观念巩固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在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绩激励下,在国内各种改革开放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在执政党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的新国际观念已经走到了难以回头的地步。

四、中国国际观念的发展趋势 ——建设和谐世界理念

现阶段中国国际观念的融入主义特征是改革开放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国际观念在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回归。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它代表的是中国摆脱传统阶段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艰难探索的又一个新阶段,它是对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地位的重新思考和凝练。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走上了新的现代化征程。在全面接受市场经济规范的同时,中国必然要接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30年的历史也清楚地表明,通过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制度安排,中国与国际接轨和

①关于中产阶级人数的估计在中国没有统一的看法,主要是关于中产阶级的界定多种多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提出的研究报告认为,能够归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约为15%。见陆学艺:《担待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如果按照职业、收入、消费和主观认同四个指标来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按其中任何一个单一指标划分的中产阶层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按职业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占全国适龄人口(16-70岁非学生人口)的15.9%;按收入标准划分,占24.6%;按消费标准占35%;按主观认同占46.8%。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标准而可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则必较少,仅占4.1%。见李春玲著:《断裂语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12页。

②参见胡锦涛:“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载《求是》,2008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

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应该说相对顺利。今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更多面临观念认同的深层次问题。中国在价值观层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进程,中国会带着自身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对国际社会构成影响。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矛盾和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冲突来临。

历史表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辩证互动中演进的。不同国家的国际观念总是作为各自文明的组成部分,必然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特征。由于国际体系的分层化发展,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的各个文明,面对不同的核心问题和挑战,都是带着自身的历史特性和文化传统去寻求解决办法的,因而必定形成不同特点的国际观念。

随着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观念的演变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在观念和认同方面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又将更多地展现自身思维和文化传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中国文化和思维传统与西方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将影响中国国际观念的进一步塑造和发展。

1. 价值观念的不同排序

科学、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17]。人权、发展和秩序是任何政治价值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任何社会来说,终极目标都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的利益和价值,满足人类的幸福追求,自由和秩序是实现人类幸福和发展的条件。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共享秩序、发展、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但中国的价值观优先次序安排与西方有所不同。

西方历来将自由和人权作为价值的优先选择,中国哲学则将秩序作为自由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强调稳定(秩序)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人权。在中国人看来,没有秩序不成社会,也没有条件开展各种社会生活。“发展……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17]这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国历来以“治/乱”判断一个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认为“天下大治”是至高无

上的政绩^{[18](P30-31)}。只有社会稳定了,发展才有可能,也才谈得上自由、民主和人权。通过对十三大以来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进行统计可以发现,“稳定”一词出现的频率分别高达9、14、26、21、19次。这表明强调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话语的主旋律,也一直是中国党和政府关注的重中之重。对秩序、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不同排序,将会继续影响中国国际观念的发展。

2. 本体论上的整体观

从深层次上讲,中国的世界观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由于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现实世界往往被看成是善恶二元对立的世界,因此,寻找敌人和对手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人则善于从全局和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为一切事物是变化的。因而,中国人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来不会将敌友关系绝对化。中国和西方在 worldview 上的截然不同,源头在于中国以“天”代替了上帝^{[19](P109-110)}。“天”运行的规律谓之“道”,“天道”皈依于“自然”,成为万物的本源。因此,中国人在本体论上强调天人合一,不仅人同自然是一体,主观世界是一体,客观世界是一体,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也是一体的。

中国人在“天下”观指导下的“世界”思维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国际的眼光”,是一种“全局的、战略的思维”^[17]。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一个全新的可能性,即超越西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形成国家理念之外的真正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

在本体论上,中国人还注重变化和发展,从不把事物看成是静止的和僵死的。相应地,在认识论上强调与时俱进地认识世界,在方法论上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因势、因主客观条件来区别对待和处理问题。正因为善于从变化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中国人始终比较乐观,对人类和世界的前途充满信心,既看到冲突、困难和挑战的一面,又看到其中蕴含的和平和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世界”理念反映了中国人的乐观向上精神,也是对“求同存异”思想的一种超越。

3. 中国的关系论

认识论上,中国人信奉“合而不同”与协调关

系,“关系”一词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20](P82)}。对中国人而言,个体必须是在不同的关系中确定角色的,个体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而是必须与其关系网中的其他人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关系。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即维持一种心理社会均衡^①。

中国人的“关系论”包括四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承认自我与他者之间差异的存在;其次是认为这种差异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第三是强调在自我与他者以及他者之间的互动中建构行为规范,而非将自我的利益、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强加于人。第四,社会关系的维系需要投入情感。情感维系的关系虽然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是矛盾易于化解,关系易于修复。总而言之,在中国人看来,现实世界是一个差异的世界,我们需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协调关系形成一个“合而不同”的和谐世界。

4. 和谐世界: 中国国际观念的新发展

当代国际制度是在西方国际观念“天/人”“自我/他者”和“国家(民族)/国际”二分法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是现代性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全球性问题的本体论根源。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开始扬弃西方“天人相分”二分法的哲学本体论,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回归^{[21](P51)},从而为关爱人类命运和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国际观念的整体论、变化论和关系论具有明显的进化式建构主义特征^②,它有可能提供一条修正当今自由主义取向国际制度弊端的合理路径。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和社会风险,既有制度安排越来越暴露出治理功能严重不足的弱点。在此背景下,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和谐世界理念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思想,呼吁行为体本着真诚的“理性互应规则”(the rule of rational reciprocity),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特定的主体间性,从而建立良性的国际行为规范^{[22](P291-292)}。回顾近代国

际关系的历史,西方大国提出的秩序理想更多的是以权力制衡权力,这几乎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思维模式。相对而言,以和平共处、正义公道、化解矛盾为基本秩序原则的和谐世界观念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视角和世界治理理念^{[23](P22-23)}。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基本内涵是融入国际社会。

目前,中国的新国际观念正处于巩固阶段,其巩固程度受到三个变量的影响:一是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成功地带来发展机遇,并创造新的利益和社会进步;二是国内中产阶级的力量是否将不断壮大,从开放政策中获利的集团是否会始终支持国际化路线;三是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走融入国际社会的合作道路。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国际观念将会继续朝着认同主导国际规范的方向发展,但其理论内核中的特殊性也会进一步凸显。因此,中国和西方在观念层面上的摩擦有可能呈上升趋势。然而,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的观念影响世界。和谐世界的理念代表了中国国际观念发展的新阶段,完善的和谐世界理论必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推动世界秩序向更公正、更合理、更和谐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 [1]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4] 郭树勇. 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 [5] 江泽民.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① Devos, & Hsu, F.L.K. 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Tavistock, 1985, pp. 24- 55. 转引自黄光国: 《儒家关系主义: 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 第85页。

② 关于儒家学说的建构主义理论取向, 见 Taku Tamaki, *Confusing Confucius in Asian Values? 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3), 2007, pp. 284- 304.

- [6]蔡拓.和谐世界标示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J].理论参考, 2007,(5).
- [7]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 [8]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统统计司.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5)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 [9]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gb/>.
- [10]万正晓,张永芳,王鸿昌.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6,(4).
- [11]廖晓琪.商务部副部长廖晓琪在博鳌亚洲论坛2005年年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3.xinhuanet.com/fortune/200504/23/content_2869786.htm.
- [12]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1).
- [13]朱立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J].国际政治研究,2007,(1).
- [14]谢淑丽.国际化与中国的经济改革[A].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与国内政治[C].姜鹏,董素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5]王正毅.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6).
- [16]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N]. 人民日报,2006-6-5(2).
- [17]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2007-2-27(2).
- [1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19]李扬帆.“天下”观念考[J].国际政治研究,2002,(1).
- [20]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1]江西元.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哲学选择及其实践意义[J].外交评论,2007,(4).
- [22]Taku Tamaki. Confusing Confucius in Asian Values? A Constructivist Critique[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3), 2007.
- [23]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J].理论参考,2007,(5).

(责任编辑 严瑾)

The Change and Consolidation of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The Dynamics and Trend

ZHU Li- qun , ZHAO Guang- cheng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ree questions: First,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up policy was adopted in 1978? Second, whether the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ideas are consolidated, and what are the dynamics for the consolidation? Third, what is the tren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what influence will it bring about? The paper holds that since 1978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have undergone a fundamental change; 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change is to merg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t present, China ' s new international ideas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consolidated; and the degree of the consolida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ree factors: first, the great benefits created by reform and open- up and the social progress it has brought about; second, the continual growth of the strength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support to the lin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y the groups benefited from the open- up policy; third, the ruling party ' s persistence in taking the road of reform and open- up and merging into the coop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 predictable future,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recognizing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norm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re will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e idea of harmonious society represents a new st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s international ideas; and China will exert more and more influence on the world through its ideas.

Key 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Ideas; ideational change; consolidation of change; trend of future development